

#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修建始末

章舜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是中国第一个综合类军事博物馆，位于北京市复兴路9号。其展览大楼于1958年10月开始兴建，1959年7月建成，1960年8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军博建筑面积达六万多平方米，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北京“十大建筑”中仅次于人民大会堂。

## 军博修建缘起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确定的军博建馆宗旨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和成长壮大的道路，阐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胜利；阐明人民军队的本质和显示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面貌，借以介绍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和建军经验，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教育全军，教育全国人民，教育后代。”也就是说，军博在建馆之初主要是为了反映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个历史时期武装斗争的情况，反映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经

过无数曲折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军史的研究和宣传，并把它作为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手段。

早在1932年1月，中央苏区就公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指出“凡死亡战士应将其死亡时间、地点、战役、功绩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汇集公布”，“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搜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展出以表纪念”。这虽然属于革命历史范畴，但由于当时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自然也属于军史的一部分。应该说，这一条例的公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搜集、整理并展示军史的尝试之一。

1932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赤卫军及政府工作人员勇敢参战受伤残废及死亡抚恤问题的决议案》再次规定，对于牺牲的烈士，“但有革命意义的物品，应保存于革命陈列馆”。

1934年1月，中央苏区中央革命博物馆正式开放，除了展示烈士事迹遗物外，也展示了苏区军民在反“围剿”斗争中缴获的战利品等。应该说，苏区中央革命博物馆既可以视为后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奏，在精神上也与军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3年3月，红军学校筹建模型室，4月10日正式开放，展出模型、图表600余件，“其中以军事内容最多”，当属建立军事博物馆的

一大尝试。特别是其中的“兵器游戏图”，寓教于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当作活的更具体的一幅江西革命形势发展图来看，里面清楚地说明着湘赣、湘鄂西、赣东北及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英勇地生气勃勃地扛着枪，擎着苏维埃旗帜在进行着夺取抚州、会师南昌的革命战斗”。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对武装革命斗争历史和烈士光荣事迹的宣传与纪念。除了举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等之外，还曾举办过一些军事方面的展览。如1946年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曾举办大型展览会，展示新旧兵器的制造、维修及使用技术，展出典型战斗战例的模型、图表和照片等。

1958年9月，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军事博物馆被正式提上了日程。1958年9月10日，中央军委第115次会议讨论通过在北京兴建军事博物馆的决定。会议确定，筹备委员会



1958年10月12日，军事博物馆大楼开工典礼后，各路施工部队开进军事博物馆施工现场

由17人组成，萧华及刘志坚、张令彬、萧向荣分别任正副主任委员。“如有必要增加时，委托萧华同志决定。”

和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一样，军博的筹建工作也分为建筑工程和陈列、行政建馆两部分。因此，总筹委下再设军博建筑工程指挥部和军事博物馆筹备办公室，分别由苏焕清、贾若瑜负责。

### 军博修建经过

军博位于西长安街延长线上，当初的选址可谓一波三折。最初选址在景山，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但由于景山是风景区，不能修建大型建筑，于是又选择了西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处。后来又选择了今天馆址以东紧靠永定河引水渠处。但水利部提出，这里要建设一个低水头发电站试验区。最后，由彭真批示，将原本规划为商场的地块圈出一块给军博和军人俱乐部使用。

1958年10月12日，军博陈列大

楼建筑工地正式开工。总筹委副主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在开工典礼讲话中指出，筹建工作“任务重大，时间急迫。明年国庆节正式开馆，八月一日就要预展”。这可急坏了施工单位。当时，负责施工的是解放军工程兵第二八一部队。设计团队还在搞设计方案，施工团队就已经进场。施工人员说：“你让我们八月一日弄完，你们现在图纸还没有。”最终，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和解放军总后设计院等单位的欧阳骏、吴国桢、阮绍先设计出了初步方案。整个建筑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修建军博大楼时，条件十分艰苦。当时的设计者之一王铁夫回忆，施工时都没有见过机械的塔式起重机，“都是人搭架子”，生生用木头搭出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挖出来的土也只能靠人力用担子挑走。

经过不到10个月的奋战，军博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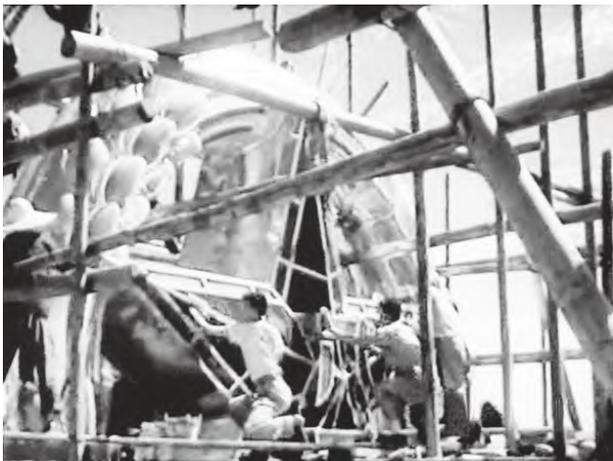


1959年7月30日，军事博物馆展览大楼竣工典礼隆重举行

终于在1959年7月29日竣工，高高耸立在北京西郊。7月30日，在军博大楼前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彭绍辉上将、李聚奎上将、刘志坚中将、萧向荣中将、周希汉海军中将、张令彬中将以及各军种、兵种的高级将领，北京市国庆工程办公室的代表参加了典礼。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在讲话中说，这是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工程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庆十周年的一项献礼，“它将陈列我军建军以来的各种宝贵的革命文物，来纪念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年来中国人民武装建设的新成就，借以教育和鼓舞全国人民，也教育我们的后代。”

这座雄伟的建筑物，平面呈“山”字形，两翼是三层建筑，中央部分高达七层，再上面是一座37.37米高的塔座，托着一个直径6米鎏金的“八一”军徽。其实，在原本的计划中，塔座上面将耸立一位解放军战士的雕像。改成军徽后，造型简洁，更加灿烂夺目。

大军徽创造了好几个纪录。一是最髙：它上沿最高点距地面94.7米，下沿正中点距地面88.7米，是“全世界设计在建筑物顶端、距地平面最高的军徽”。二是最大：它直径6米，厚度约为2米。三是最重：它用黄铜铸造，重达2.5吨。四是最贵：它通体鎏金，使用了特批的300两黄金。



在楼顶组装军徽

如此庞然大物，从铸造到安装都给工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当时技术水平有限，五角星是由东直门外一个小工厂靠手工制造出来的，“在外面的马路上砸角钢，都是手工打的”。军徽上有一圈麦穗，则是由上海红光厂制造的，一粒一粒麦穗也是工人用手工打造出来的。

安装军徽时，有人传说是用直升机吊到空中安装的。其实据当事人回忆，“那时候还没见过直升机，也吊不动”，而是如前所述用木头搭起100多米高的脚手架，再搭起一个平台，将一个个部件用人工扛到高空，在那里焊接组装而成的。

军博的四扇厚厚的大铜门也有一段传奇故事。门上“雕刻着盾牌、红缨枪、冲锋枪、指挥刀等各种武器，周围还刻有以麦穗、红星和旗帜组成象征胜利的花环”。大门和兵器馆铜门的原料来源于福建前线战士们在金门炮战中收集的废炮壳，以及抗美援朝中收集的美军炮弹

壳。大门两旁是两组大型群雕，东面一座表现的是海、陆、空战士，西面一座则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组成的民兵队伍群像。

跨过大门，就进入一个方形的中央大厅，这是整座建筑的中心。它的墙壁、柱子和地面，“都是用紫铜色、晚霞色等十多种颜色的大理石装成的”，栏杆四周塑造着以八一军徽、红旗组成的装饰花纹。天花板上则镶嵌着一盏放射出128条镀金光芒线的红星灯，整个大厅可谓庄严肃穆，高贵典雅。最初，军博使用的柱子等都是人造大理石贴面装饰，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参观后特批采用天然大理石。一种是请陆军第六十七军从青岛开采的，还有一种是请陆军二十六军在莱阳水沟头开采的，为军博增添了不少风采。

中央大厅东、西两翼各有三层，每层有式样大致相同的三个展览厅，再加上主楼四层的两个展厅，一共有20个展厅，“展览面积达二万九千多平方米，比1954年竣工的北京展览馆的展览面积大一倍多，每天可容八万到十万人参观”。此外，三层中央还有能容纳500人的电影厅，五层则是彩画贴金装饰的游艺厅，七层是美工室、研究室。

展厅基本上是按历史时期分布的。一层东侧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馆，西侧是抗日战争馆；二层是解放战争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馆，三层是抗美援朝馆。馆内，除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外，还有各类照片、美术作品，并布置

了井冈山沙盘和“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长征路线图”等巨大的模型和电动图，使观众能够更为直观地了解革命军史。

从中央大厅北门出去，是兵器馆。该馆长93米，高22米，由七个大圆拱组成屋顶，和北京展览馆的工业馆很相似。馆内分两层展览了从古代弓箭到现代枪炮等各式武器，其中不少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兵器馆两旁还设有两个面积7000平方米的露天陈列厅，专门陈列室内放不下的坦克、飞机、登陆艇等重型武器。

## 文物征集与布展陈列

为了真正建成一个一流的军事博物馆，军博的建馆工作是和大楼建筑同时开启的。

建馆的第一步是收集文物。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向全国征集文物。1959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陈列同时布置就绪。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领导同志审查了两馆陈列，并于9月22日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问题，“批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通史陈列可以公开试展，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革命史陈列内容和形式都尚需修改，可先在共产党内部征求意见”。因此，中国历史博物馆先行对外试行开放。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史陈列修改的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和康生任

正副组长，成员包括杨尚昆、刘澜涛、胡乔木、萧华等人。经过几次大修改后，革命史陈列通过审查。

1958年9月15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全军各单位成立军博筹备委员会分会或小组，负责在辖属范围内收集展品，包括实物、历史文献、烈士遗物、图表、照片、美术作品等，于1959年3月底以前派专人将展品护送到京。11月12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通知，征集“能表现人民军队的特点”，“能代表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特征”和“有纪念意义和保存价值”的展览品，并要求筹建军博要“全军动手”，“有宝献宝，无宝献计”。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们对此予以了高度的支持。首任馆长贾若瑜回忆，“只要你需要的文物，只要他有的，你问他要，他就给”。在收集到的高级领导人的文物中，来自毛泽东的最多，周恩来有20件，林彪28件，其他元帅各10多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保存了十多年的叶挺同志的遗物交给了博物馆，这些遗物在艰苦的战争情况下曾辗转了几十个地方。四川乐山军分区司令员钱树登有一条皮带，长征途中吃了两次没有吃完（吃掉了几寸），这次也主动献了出来。

在征集过程中，还发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成都部队征集到一只20多年前的



1959年9月，朱德委员长审查军事博物馆陈列

小酒杯。原来，1935年10月，荣经县关镇关田坝农民梁银章曾经为红军带路。临别时，红军送给梁银章一只酒杯，并说：“老同志，我看你好喝酒，送你一个酒杯吧！看见它就等于看见了我们，以后我们回来，再来看望你。”梁银章在1936年临终时再三叮嘱他的妻子：“这是红军送的酒杯，要好好保存，将来红军还要回来的。”最终，从全国征集到100多万件展品（含有关图片资料），馆方从中筛选了12万件，最终拿出2万件，作为展览的基础。

光有展品不行，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做好陈列工作。1958年10月22日，筹委会博物馆办公室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博物馆历史馆展览大纲（初稿）》。为了做好陈列工作，从全军抽调来的工作人员克服经验不足的问题，认真学习党史军史，积累了内容编辑、陈列设计和文物人员三结合的重要经验，“共同研究探讨，形成最佳方案，报请领导审

查、批准，然后进行施工制作、布展”，以迎接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人的审查。

在陈列工作中，军博的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澄清了许多党史军史上不准确的说法。如八一南昌起义，这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的大事件，当然是军博需要重点展示的内容。可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都有谁？当时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里面提及南昌起义是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领导的。研究人员感觉这可能不准确，贾若瑜便亲自去找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仔细思量之后，在国务院信笺上写下“南昌起义领导人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字样，作为军博陈列的依据。再比如，彭德怀在1959年遭到错误批判后，军博曾收到通知，要把关于彭德怀的所有文物撤去。军博馆方觉得撤掉了就说不清解放军的历史，于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先后找了罗瑞卿、陈赓、聂荣臻、刘伯承等将帅说明情况、征求意见，大家都表示撤不得。最终，萧华表示不撤，予以保留。

军博建成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予以了高度关心。1962年夏，军博报请毛泽东为军博题写馆标。毛泽东欣然同意，在六页信笺纸上写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1个大字。他还对萧华说，“这是近年以来我写的最大的字”。

## 续写新辉煌

为了庆祝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提前开放。那段时间，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将帅纷纷前往参观和指导工作。由于军博宗旨之一是“阐明人民军队的本质和显示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面貌，借以介绍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和建军经验”，军事博物馆建馆初期接待了许多来华取经的参观者。不少来自拉美、非洲、东南亚的正在争取民族解放或已经夺取政权的参观者来这里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怎么建设人民军队、怎样进行人民战争、怎样用弱军对付强敌”。

1983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调整充实军事博物馆陈列内容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军事博物馆……今后要收集、研究、陈列我们祖国历史上有关军事的、战争的、武器的史料，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军事遗产教育人民。”这样，军事博物馆就由初建时期主要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博物馆，逐步转变为国家军事博物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新征程上，军博在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责任编辑 姜睿）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